



教育与证道学

来源：证道学世界网站 (<https://www.theosophy.world/>)

版权所有：证道学出版社，马尼拉

翻译：徐子宸 (Sagesse)；校译：杜巍巍

原文请参阅以下链接：

<https://www.theosophy.world/encyclopedia/education-and-theosophy>

在现代证道学运动存在的前半时期，我们相当重视在世界各地设立证道学校。

海伦娜·布拉瓦茨基 (Helena P. Blavatsky) 在她的《证道学要诀》(Key to Theosophy) 中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她强烈批评了世界上盛行的现行教育制度，这种制度导致“市面上充斥着赚钱机器、无情且自私的人——如动物一般——他们被及其细心地训练来捕食他们的同伴，且学会利用他们弱小同胞的无知！”她用这些话概述了证道学教育的原则：

“如果我们有钱，我们会建立学校，以培养一些不是为了果腹而读书的人。孩子们首先应该被教导独立自主、爱天下人、利他、相互施舍，还有更重要的是有独立的理性思考能力。我们会将死记硬背的工作减少到最低限度，用通常花在这上面的时间去开发内在感知、天赋和潜能。我们将努力把每个孩子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通过教育使他和谐平衡地开发他的能力，并使他们的独特天资得到最自然的发展。我们的目的在于培养自由人，智力上的自由人，道德上的自由人，不带任何偏见的人，最重要的是“无私的人”。我们相信以上几点的大多部分，哪怕不是全部，都可以通过适当的和真正的证道学教育来获得。”（证道学要诀，第 13 节）

证道学学会在教育方面的作用可以分为两部分：由证道学学会直接管理和资助的全部或部分教育机构，以及由其成员承担的与证道学学会本身没有直接联系的教育机构。一方面，对这一主题进行完全涵盖或全面回顾将超出此种性质文章的范围，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连续的历史记录，这也自然是几乎不可能的。在一些国家，战争、革命或政府政策的创伤导致了历史记录破坏，尤其是在二战期间被德国军队占领的一些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证道学学会在许多极权主义政权中不受欢迎。且可悲的是，许多著名的教育企业在当时被认为不够重要，无法以任何形式持续详细地记载。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证道学学会在儿童教育方面可发挥的作用是由证道学学会（阿迪亚）的第二任会长安妮·贝森特（Annie Besant）非常明确提出来的。她认为，把孩子看作是出生时的一张白纸，因环境的影响而在白纸上记下他或她的性格，或者认为孩子只是生物遗传的产物，都是严重的错误。她写道，那些持有基督教观点的人对孩子的传统看法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孩子是出生时新创造的灵魂。另一方面，证道学认为每个人都是一系列漫长化身的结果，这些化身塑造了个人的性格和智慧程度。既然如此，贝森特写道：“对证道学研究者来说，每个孩子都是一项研究，（教师）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她），而是试图发现孩子身体的内在主人。他（她）试图帮助内住的统领，而不是篡夺他的王位，他应该成为一个参谋，一个顾问，而不是一个主人”（阿迪亚手册，第 16 号）。这种教育方法在随后的几年里得到了许多教育家的认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证道学学会成员玛丽亚·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1870-1952）。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安排在证道学学会阿迪亚总部居住（见《蒙台梭利教学法》，英文版本，1912）。

印度的教育工作。

证道人最早所建立的学校之一是在 1894 年由证道学学会第一任主席亨利·奥尔科特（Henry OLCOTT）主持下成立的。他的目的是为印度的一些“贱民（untouchables）”提供免费教育，当时这样的人大约有 6 千万。孩子们接受的是泰米尔语的小学教育，课程包括英语教学。奥尔科特学校是在阿迪亚庄园的一间简陋的泥屋里开始的，当时有 45 名学生。这所学校一直持续到今天，当然，住宿条件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1898 年，另一所学校在距离阿迪亚约 7.5 英里的科丹巴肯开始运营。这所学校以创始人之一海伦娜·布拉瓦茨基的名字命名为 HPB 学校。第三所学校于 1899 年 10 月 2 日在泰南佩特（Teynampet）成立，有 27 名儿童，以学会的早期工作人员达莫达尔·马瓦兰卡尔（Damodar K. MAVALANKAR）的名字命名为达莫达尔（Damodar）学校。第四所学校于 1901 年 9 月在米拉波（Mylapore）开办，以泰米尔圣人蒂鲁瓦卢瓦尔（Tiruvalluvar）命名。1905 年，所有的学校都被纳入一个由八名成员组成的董事会管理之下，并决定将这些学校称为“奥尔科特·潘查马公益学校”。1906 年 5 月，应马德拉斯（Madras）（现在的金奈 Chennai）市政府的要求，在克里希南佩特开设了第五所学校，即安妮·贝森特学校。

安妮·贝森特对促进印度儿童更好的教育体系格外关注，1898 年，她在贝拿勒斯市（Benares）（现在的瓦拉纳西 Varanasi）创办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开办一年后，贝拿勒斯的统治者捐赠了一大片建筑和一片土地，价值 5 万卢比，学校就搬到了这个地方。中央印度教学院的名声很快就传开了，学生们蜂拥而至。1903 年，后来成为证道学学会会长的乔治·阿伦代尔（George Arundale）加入了学校的工作人员，并最终成为校长。它后来成为贝拿勒斯印度大学，如今是印度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

1913 年，证道学教育信托基金（Theosophical Educational Trust）作为一个注册机构成立，安妮·贝森特担任第一任主席。它的目的是鼓励和管理学会的教育工作，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企业。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多年来，许多由证道学学会建立、资助和管理的学校都被地方政府接管，但奥尔科特学校（Olcott school）仍在阿迪亚运作。位于贝森特花园的贝森特纪念学校（The Besant Memorial School）成立于1934年，到1938年有140名学生和20名教师。（参见《证道学在印度 INDIA, THEOSOPHY IN.》）。

目前（2016年）印度的教育工作是由独立的信托机构或团体进行的，如奥尔科特教育协会（Olcott Educational Society）、贝森特教育研究会（Besant Educational Fellowship）和印度证道服务社（Theosophical Order of Service）的各个分支机构。在印度有十多所这样的学校。

斯里兰卡的教育工作。

当 H. S. 奥尔科特在1880年到达斯里兰卡（当时称为锡兰 Ceylon）时，震惊地发现，只有两所学校由佛教徒管理，一所在多丹杜瓦（Dodanduwa），另一所在帕纳杜拉（Panadura），共有246名学生，每年从英国管理的政府获得523卢比的补助。相比之下，基督教传教士管理的学校有805所，有78,086名学生，接受政府拨款174,420卢比。此外，关于佛教的书籍都是由基督教徒撰写的，对佛陀的教义进行了高度的歪曲。难怪受过教育的公民，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人，都在背离他们古老的信仰。奥尔科特立即关注到有必要处理的教育问题，这成为他在斯里兰卡复兴佛教的努力的一部分。

奥尔科特对斯里兰卡最重要的贡献可能是创办了一系列学校，这些学校由佛教徒和证道学学会的成员管理。第一所学校是在1880年6月17日开始的，正好是他在该岛登陆后一个月。为此，他成立了一个名为佛教证道学会的分会，并在斯雷乌岛一个名为“红崖 Red Cliff”的房子里开办学校。它的目标是“通过保护佛教和加强佛教徒的信仰来促进佛教；实践佛教道德教义；传播和教授佛教教义”。这个目标同样表达了他为斯里兰卡各地开办教育机构的目。

由于政府的财政支持很少，而且奥尔科特希望保持对政府的独立性，因此他建立了一个国家教育基金，世界各地富有的佛教徒以及证道学人都慷慨解囊。然而，他也注意到，即使他被拥戴着去参加长龙游行，有旗帜、横幅和欢呼声，“虽然有很多荣耀，但基金的现金依旧很少”。在一个地方只收集到了42.77卢比，在另一个地方只收集到50.00卢比。这表明他所面临的困难。然而，当他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激励穷人追随佛法时，这些人在他们微薄的财力允许的范围内，也会为他的事业慷慨的作出贡献。

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在科伦坡（Colombo）的马利班街（Maliban Street）购买了一处房产，1885年在那里创办了一所英语高中，由查尔斯·利比德担任校长，利比德一直担任这个职务到1889年。这所学校现在已经成为阿南达学院（Ananda College），据说是斯里兰卡最著名的教育机构。1992年，斯里兰卡议会的21名成员中有6名是其毕业生。即使到了今天，证道学教育的理想仍然保持着，学校的一天从向佛祖献花和诵读《帕尼卡-西拉》Pañca-sila (P)、《特里萨拉纳》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the Trisarana (P) 以及《法句经》Dhammapada 中的部分诗句开始。吉纳拉贾德萨 (C. JINARAJADASA)，学会的第四任会长，是其特许班的学生，后来在 1900 年成为其副校长。另一位著名的证道学研究者，来自美国的弗里茨·昆茨 (Fritz KUNZ)，于 1914 年成为该校校长。

另一个著名的教育机构是马欣达学院 (Mahinda College)，由奥尔科特于 1880 年 9 月 15 日创建。它最初是加勒佛教证道学会学校，有 500 多名学生。但是，为了抵制它的影响，富有的传教士取消了教会学校的收费，佛教徒公众失去了对佛教学校的兴趣，所以它的实力迅速降低，不得不关闭。1891 年 9 月 1 日，来自伦敦的基督教牧师和证道学人 Bowlers Daly 恢复了该学校。1892 年 3 月 1 日，他从苏曼加拉 (H. Sumangala) 牧师手中接过潘西尔 (Pansil)，并给学校起了现在的名字。但在他于 1893 年因缺乏佛教徒的支持而放弃校长职位后，学校开始恶化，以至于阿马拉苏里亚 (M. T. Amarasurya) 向奥尔科特发出紧急请求，请求帮助。奥尔科特发出了招募志愿者的呼吁，著名的巴利文学者弗朗西斯·李·伍德沃德 (Francis Lee Woodward) 响应了这一呼吁，他以极大的热情担任了校长。他很快也变得心灰意冷。奥尔科特随后在 1904 年和 1906 年访问了学院，鼓励他并提出了新的想法。随后，为了纪念奥尔科特，学院建造了一个新的大厅，并建造了一个宿舍和其他一些建筑物。学院的复兴比预期的要大，因此要求设立一名副校长；1913 年，安妮-贝森特派另一位证道学研究者 F·戈登·皮尔斯 (F. Gordan Pearce) 来填补这一职位。然而，最著名的校长也许是埃德加·A·维苏里亚 (Edgar A. Wyesuriya)，他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了 32 年。因此，尽管历史上有过起伏，但由于学会和一些成员的不懈努力，马欣达学院是另一个成功的故事。

在女童教育领域，证道学人玛丽-穆塞斯-希金斯 (Marie Musaeus Higgins) 的工作意义重大。在彼得·德·阿布鲁 (Peter de Abrew) 和来自澳大利亚年长的埃尔西·皮克特 (Elsie Pickett) 的协助下，她于 1891 年创办了桑格米塔 (Sanghamitta Girls' School) 女子学校，后来以她的名字命名为穆塞斯佛教女子学校 (Musaeus Buddhist Girls' School)。除了正规的教育和佛教教育外，希金斯还对女孩进行缝制、编织、刺绣和各种家务劳动的培训，努力使她们摆脱不愉快的顺从生活，并使她们成为智慧妻子的模范。

在 1896 年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斯里兰卡之行中，奥尔科特不仅参观了上述学校，还参观了其他几所佛教学校，其中一些是由证道学人开办的，正如他在《旧日记》(第 6 卷，第 6-18 页) 中指出的那样。由学会成员在贝鲁埃 (Beruela) 开办的男校有 60 名学生；在安伯朗戈达 (Ambalangoda) 有两所男校和两所女校，共有 860 名学生，“这些建筑对当地的佛教教育促进者来说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ODL, vol. 6, 第 7 页)；加勒的郊区——北丹吉德拉、南丹吉德拉、米里潘纳和哈巴拉杜瓦——有四所学校，阿汉加马有两所“优秀”学校，分别有 221 名和 259 名学生，其中一所学校是奥尔科特在 1888 年亲自奠基的。在康提，奥尔科特参观了学会成员作为男子高中创办的学院以及独立的男子和女子学校；在康提郊区，他参观了佩雷德尼亚和安皮提亚村的两所学校；在马塔莱，他发现其男子学校“发展得非常好” (同上，第 9 页)、在拉托塔 (Rattota)，在其首席赞助人古内塞卡拉 (Goonesekara) 博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士的陪同下，他参观了由当地学会成员创办的女子学校；在瓦特加马（Wattegama），他视察了“我们的男子和女子学校”（同上，第 10 页）；在小山村帕努埃拉（Panuela），他得知其女子学校的所有学生最近都通过了政府的认证考试，“每科都很完美”（同上）。在贡波拉（Gompola），他发现学校位于其赞助人“已故的穆汉迪拉姆（Muhandiram）”所建的“非必要的巨大”建筑中（同上，第 12 页）、在附近的纳瓦拉皮蒂亚，学校在四个月前刚刚开始，但已经“完全清空了基督教学校的学生”（同上）；在山城哈顿，他注意到由证道学家 C.F. 鲍威尔创办的学校有 60 名学生，“现在没有一个佛教男孩在基督教学校”（同上，13 页）。在卡丹纳瓦，奥尔科特参观了女子学校，并在附近的加达拉尼亚参观了一所“混合学校”（同上，第 15 页），这两所学校都是由证道学学会成员创办。他还提到了对帕塔拉吉德拉（Pattallagedera）、内迪马（Nedimale）、基鲁拉帕（Kirulapane）、莫里图穆勒（Moritumulle）和 Indepette 等地学校的访问。在所有这些地方，他都发表了演讲，并为学校筹集资金。

然而，奥尔科特小心翼翼地指出，“锡兰的教育工作..... 正确地说，不是证道学学会本身的活动，而只是由佛教徒组成的锡兰分部的一项工作。... 同样，它也是我们的佛教同事在我们的运动中取得的最重要和最成功的成果之一。...”（同上，第 11 页）。尽管如此，亚当峰的高僧苏曼加拉法师（H. Sumangala）在 1896 年 12 月 2 日写给奥尔科特的信中，表达了斯里兰卡佛教界对奥尔科特个人的极度感激，“他开创并鼓励在锡兰的佛教善男信女中普及世俗和宗教教育，并为佛教徒争取到他们在你 1880 年首次到达之前所没有的宽容和不受迫害的自由”（同上，第 95 页）。

到 1935 年，共有 407,904 名儿童，即斯里兰卡 65% 的儿童，在佛教学校接受教育，其中 229 所学校由证道学会直接管理。正如往常的情况一样，斯里兰卡在 1947 年获得独立地位后，各种教育设施被政府接管。

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教育工作。

1915 年在英格兰成立了两个机构，以促进证道学教育；它们是证道学教育信托基金和证道学教育友情会。该信托基金一开始就开办了两所学校，即位于莱奇沃思（Letchworth）的花园城市联合教育学校（Garden City Co-Educational School）（后来称为阿伦代尔学校 Arundale School）和位于肯特郡布罗姆利的布拉肯希尔学校（Brackenhill School）。这些学校专门为无家可归或贫困的儿童服务。其他各种学校也受到该信托基金的照顾，1918 年，爱丁堡附近的亚瑟王联合教育寄宿学校（King Arthur Co-Educational Boarding School）和格拉斯哥的莫里学校（Morey School）也开始运营。莱奇沃思的学校发展非常迅速，1919 年，一所新的学校——圣克里斯托弗（St. Christopher）启动。1922 年，基金会的工作被决定集中在莱奇沃思，并在圣克里斯托弗周围建立一个学校社区。1924 年左右又成立了一所教师培训学院。

印度尼西亚的教育工作。

1913 年，一个有影响力的教育机构在爪哇开始了，名为萨里山教师培训学院（Gunung Sari Training College for Teachers）。其董事会和工作人员都是证道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学学会的成员。到 1925 年，该学院已招收了 120 名学生，每年约有 20 名教师毕业。这所学院成为传播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主要中心。该学院于 1927 年迁往伦邦（Lembang），1937 年因政府撤销补贴而关闭（Iskandar P. Nugroho, 印度尼西亚殖民地的证道学教育运动 The Theosophical Educational Movement in Colonial Indonesia [1900-1947]）。

下列学校是在证道学的影响下建立的：阿朱纳（Arjuna）小学（1920 年）、塔曼斯瓦（Taman Siswa）小学（1922 年）和卡萨特里亚安（Ksatria）学院（由证道学人杜维斯·德克尔 Douwes Dekker 建立，1924 年）。1920 年 4 月，在印度尼西亚分会的大会上，成立了荷属东印度群岛教育证道学联盟（Nederlandsche Indische Theosofische Bond voor Opvoeding en Onderwijs），并在随后的几年里在建立一些小学方面发挥了作用。到 1925 年，在 Ned. Ind. 教育联盟的领导下，办了一所教师培训学院（道尔顿系统）；九所阿乔埃纳（Ardjoena）学校；两所蒙特梭利（Montessori）学校；和一所阿比曼乔（Abimanjoe）学校。

许多著名的印度尼西亚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将他们的教育归功于证道学学会。前总统苏加诺的父亲苏克米（R. Sukemi）是一名终身证道学学会会员，苏加诺花了很多时间在证道学学会的图书馆学习（同上）。

据努格罗霍说，证道学学会在印度尼西亚教育中的作用可分为四个阶段：

1. 1900-1912. 在这一时期，证道学学会教育运动是爪哇民族主义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2. 1912-1920. 在这一时期，证道学运动（NITV）在刺激印度民族主义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 1920 年和 1930 年代初。“证道学教育运动特别是通过在爪哇岛各地建立阿朱纳学校，对培养具有‘萨提亚（satria）’品质的民族主义者的想法的出现负有责任，这影响了建立反殖民的想法，导致了非合作性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同上）。
4. “证道学学校的毕业生、证道学奖学金获得者、前印度教骑士团成员和青年证道学人运动在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和公共生活中变得十分活跃。．．．独立后，证道学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同上）。

1926 年，有 15 所证道学学校，配有 15 名欧洲人和 42 名爪哇教师，有 2000 名学生。从 1942 年起，大多数私立学校逐渐被政府接管，只有苏拉卡尔塔（Surakarta）的阿朱纳中学仍在运作，但据说它不再像以前那样接受证道学的理念了。

美国的教育工作。

最早的证道学学校名为金门学校（School of the Golden Gate），于 1916 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开办。由于缺乏资金，它于 1924 年停止了工作。

最重要的证道学教育实验之一可能是 1900 年在洛马角（Point Loma）的证道学学会开办的皇道瑜伽学校（Raja Yoga School）。它开始时只有五个学生，但发展很快。洛马角社区的领导人凯瑟琳-丁利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次演讲中阐述了她对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儿童教育的看法；她首先评论了盛行的加尔文主义，接着说：“证道学教导的是与此完全相反的东西。它宣称，我们在本质上是双重的；我们为一个崇高的目的而出生；我们的灵魂和我们的精神本性是辉煌的，具有人类生活的所有无限可能性；灵魂是认知者，是启发者；灵魂是不朽的，身体是有限的；所以身体有它的弱点，它的激情，它的贪婪，它的欺骗，它的不完美；它在这个层面上是为了自我进化；它不是邪恶的，它只是未成就的善。因此，我们的灵魂是启发者，是保护者；而思想是载体，从这个更高的来源接受灵感，只要它能做到。（另见证道学会，帕萨迪纳 THEOSOPHICAL SOCIETY, PASADENA.）。

到 1905 年，其他皇道瑜伽学校在旧金山、洛马角庄园附近的罗塞维尔和圣地亚哥建立。旧金山的学校在 1906 年的地震和火灾中被摧毁。这些其他学校也未能长起继续。

菲律宾的教育工作。

菲律宾的学会在 1947 年在其国家总部大楼落成后的某个时候建立了它的第一所小学。它有多达 100 名学生。虽然这所学校在几年后最终关闭，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恢复了这项工作，并一直持续到现在。菲律宾学会分部目前（2016 年）有五所学校，其中最大的是金联学院（Golden Link College）。所有学校都强调个性和人格的发展，培养开放和自由的心态，尽量减少有害的对人格塑造的限制。因此，这些学校没有排名、竞赛或竞争；他们不使用恐惧作为激励的工具。这五所学校是

- 金联学院（北卡洛坎市 Northern Caloocan City）--设有学前班、小学、高中和大专课程，提供教育、信息技术、心理学和工商管理等方面的学士学位。它还为教师提供证书课程。
- 金联学院 Bohol 校区（Cortes, Bohol）--提供学前班和小学课程。
- 阳光学习中心（奎松市 Quezon City）--1985 年左右成立的学前班
- 证道服务社学习中心（北卡洛坎市）--为卡洛坎市的贫困社区提供的学前教育。
- 鲁门学校（Lumen School）（西内格罗省巴戈市 Bago City, Negros Occidental）--学前、小学和中学阶段。

澳大利亚的教育工作。

澳大利亚对教育的兴趣最初集中在“亚正常”和“超正常”儿童上，并热情地支持幼儿园运动。1918 年，在悉尼的莫尔文花园（Morven garden）开办了一所证道学寄宿学校，到 1920 年已招收了 112 名学生；尽管它曾兴盛过一段时间，但在 1923 年被迫关闭，原因可能是当时悉尼会所出现了问题。澳大利亚的第一所蒙特梭利学校是由证道学研究者露西·斯彭斯·莫里斯（Lucy Spence Morice）于 1912 年在阿德莱德开办的。莉莉·阿诺德（Lily Arnold）和杰西·麦克唐纳（Jessie Macdonald）从 1913 年开始在斯坦莫尔（Stanmore）的阿普斯利大厦为女童提供证道学教育。1915 年，在塔斯马尼亚的达文波特开设了另一所证道学学校。1929 年以来的经济大萧条见证了澳大利亚大部分证道学教育事业的消亡，现在没有一家幸存了下来。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在新西兰的教育工作。

新西兰的第一个证道学教育项目是 1919 年成立的瓦桑塔学院 (Vasanta College)。这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存活到 1959 年的此类学校之一。1937 年 7 月，瓦桑塔学院的校长证道学人贝塔·哈泽尔·达罗奇 (Bertha Hazel Darroch) 被选为新教育联谊会第七届地区会议的委员会成员。

缅甸的教育工作。

1938 年，据报道 (1938 年年刊)，缅甸教育信托基金 (一个证道学信托基金) 负责管理一所女子学校、一所男子学校和一所成人夜校，共招收 750 名学生。

在中国的教育工作。

1925 年 9 月的《证道人》(Theosophist) 杂志载有一封由多萝西·阿诺德 (Dorothy Arnold) 和弗吉尼亚·兹 (Virginia Zee) 签名的信，宣布她们打算在中国开办一所女子学校，但没有透露地点。然而，1938 年的《证道学年刊》指出，多萝西·阿诺德在上海创办了一所贝森特女子学校。在新中国成立后，所有这些机构都被关闭。

克里希那穆提学校 (Krishnamurti Schools)。

克里希那穆提是查尔斯·利比德 (Charles Leadbeater) 和安妮·贝森特 (Annie Besant) 的门生，从 1909 年到 1929 年在证道学学会的影响下接受教育，1929 年他与证道学学会断绝了联系。在他开始独立工作后，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成立了，并通过它建立了一些学校。虽然这些学校过去和现在都完全独立于证道学学会，但它们所遵循的许多理念确实反映了克里希那穆提早期接受的证道学教育。

华德福学校 (Waldorf Schools)。

华德福学校的创始人是鲁道夫·斯坦纳，他是德国证道学学会的重要成员，曾在 1902-12 年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德国分会秘书长。1912 年后，斯坦纳切断了与证道学学会的联系。他看到了色彩和音乐对健康和整合的意义，并发展了涉及音律节奏 (eurhythmics) 和七年发展周期的教育理论。这些理论被世界各地受人尊敬的华德福或斯坦纳学校所实施。

P. S. H. /C. V. A. /V. H. C. /R. W. B.

© Copyright by the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Manila
版权所有，证道学出版社，马尼拉